

# 持续增强和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郭丽岩

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优势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不仅是经济运行的稳定器，更是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的动力源。“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強、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非只体现在规模效应上，而且是包含拓展增量、提升质效、畅通循环等多个维度在内的系统性优势。“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复杂变化，深刻理解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要义，持续增强和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是我国在世界百年变局中把握战略主动、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 强大底气和定力所在

在大国博弈中，市场本身就是稀缺资源和重要筹码。“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之所以构成战略依托，关键在于国内市场的广度、深度与韧性，这为我国保持战略定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有力支撑。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外部技术封锁，超大规模市场能够为企业提供替代性成长空间，加速关键技术攻关与国产化进程，尤其是能为硬科技的长周期研发应用提供更多耐心资本和应用场景。

我国依托大市场扩大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力。从国际经验来看，拥有较大市场规模的经济体，在国际贸易谈判、标准制定、规则协商中拥有更大话语权和回旋余地。我国已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将供应链关键环节布局在我国，以贴近终端消费市场、降低物流成本、快速响应需求变化。同时，我国在5G通信、移动支付、新型零售等领域逐步形成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市场标准与商业模式。

与此同时，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可以满足多样化和多层次的需求，从而提高供需适配性、增强供需平衡性。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区域市场发展呈现梯度特征，从城市到县域、东部到中西部，纵向和横向不同板块之间具有互补支撑性，能够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新变化。在国际经贸斗争中，我国内需市场对经济基本盘的支撑作用愈发明显，展现出抗冲击的强大韧性。当部分城市消费增速有所放缓时，还有广阔的三线及以下城市、县域及农村的市场可以进一步释放需求潜力，促进消费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 形成要素资源引力场

市场的规模经济和成本优势是影响专业

化分工的重要因素。超大规模市场的规模经济效益明显，能够支撑更加精细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分工，催生更高效率的供应链网络，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本土企业的竞争优势，也有利于汇聚全球高端要素，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要素支撑。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近年来迅速发展，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离不开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支撑作用。大市场可以吸引国内外资本、人才、技术、数据等优质资源集聚，驱动“三电”系统、智能驾驶等全产业链核心技术实现快速突破和降低成本，进而扩大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还要看到，我国市场拥有数量庞大的消费群体生成的海量数据，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这将进一步增强全球资本的投资意愿，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顶尖科学家、工程师来华发展和企业研发中心进驻，为智能经济、数字经济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并非静态优势，而是一个动态增强的系统优势。短期来看，体现为对现有资源要素的集聚与整合；长期来看，通过发展新技术新业态，催生出更高的要素升级需求，从而不断强化市场对先进优质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各类生产要素越是充分流动、高效配置，经济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在汇聚全球高端要素的同时，也能进一步促使国内产业升级与制度创新，形成“要素汇聚—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更强引力”的正向循环，从而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尤其在技术迭代迅速的领域，超大规模市场的包容性更加凸显，广阔的市场空间能够有效分散投资风险、提高资本长期配置意愿，为不确定性较高的创新项目提供更稳定的预期收益，多样化多层次的市场需求会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优化供给结构和拓展产品谱系，从而持续吸引国内外创新资源联动合作。

## 孕育活力生发动力

我国市场的活力体现在创新型企业驰而不息的试错与追赶之中。超大规模市场是新技术新产品孵化的“加速器”，能够大幅缩短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商业化进程，进而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得益于我国市场纵深广阔，新技术新产品可以快速匹配到初始用户，完成“从0到1”的验证突破，并依托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迅速摊薄研发成本，有机会实现“从1到N”的持续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企业可以依托本土庞大用户群快速完成技术迭代，不断打磨商业模式，降低创新试错成本，从而有机会实现从模仿创新到原始创新的跃升。

我国市场的活力蕴含于需求端到供给端不断螺旋提升、向新向优的过程中。我国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直播带货等的发展速度和普及程度领先全球，依托海量数据和丰富应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強、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用场景，在人工智能、5G、大数据应用等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商业优势。从行业龙头到中小微企业、再到个体创业者，形成了广覆盖、多层级的竞争格局。各类企业依托数字化平台，显著提升了对个性化品质化需求的响应速度，进一步激活了消费市场潜能。许多具有鲜明特色和市场前景的新业态新模式不仅实现了自身快速增长，也积厚成势形成了赋能千百万中小商户和创作者的生态系统。例如，依托偏好数字化消费的庞大年轻消费群体，在美妆、食品、电子产品等领域涌现出了很多新国货品牌，直播电商也催生了主播、运营等即时零售供应链相关的新职业形态，释放出强劲的经济活力。

## 综合施策释放优势潜能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新领域新赛道不断涌现，为我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加快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激发内需潜力，形成内生增长动力。与此同时，尽管我国市场优势明显，但在市场发展和建设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必须客观认识和妥善应对。例如，局部存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行为，影响市场整体规模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当前供需需弱矛盾突出，有效供给能力尚待增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与高端优质供给不足并存，难以满足消费升级需求；收入分配、市场基础设施、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仍有制约消费的堵点卡点。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大市场进一步释放潜力和迸发活力。对此，需从多方面综合施策，以制度建设增强市场包容性，以创新驱动增强供需适配性，进一步激发多元消费活力和多层次市场潜力，强化我国市场的辐射力和吸引力，推动“大市场”向“强市场”转变。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制定出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重点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标准认证、监管执法上实现统一，破除各种隐性壁垒，确保要素和商品在全国范围内自由高效

流动。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高标准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办好中国品牌日活动以及进博会、消博会等重大展会，让我国大市场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 and 全球吸引力。

促进产业链创新链紧密结合，持续增强供需适配性。进一步强化竞争激发创新、创新拓展市场的良性循环，实施“揭榜挂帅”机制，更多以产业需求、市场需求为导向组织科技攻关，让企业成为创新决策和成果应用的主体。发挥场景驱动创新作用，在能源交通、健康医疗、城市治理等领域谋划开放一批重大应用场景，为前沿技术提供更广阔的应用示范空间。深入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优化市场结构。

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拓宽经济增长空间。超大规模市场之大，在于人口规模庞大，更在于消费潜力之厚、层次之丰、模式之新。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稳定消费预期、改善消费环境。促进传统消费提质扩容，推动新型消费加快发展，激发多层次消费与投资潜能。以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导向，培育智能家居、文体娱乐、健康养老等新增长点，促进多元化服务供给，加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保障，增强供给侧对中高端需求的适配性。培育壮大绿色消费市场，健全碳排放权、用能权交易市场，引导资金投向科技创新、现代产业、绿色转型等领域。

加强区域协调发展，释放多层次市场潜力。聚焦区域市场高质量发展，强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的创新策源作用，加快推动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等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促进县域经济特色化发展。进一步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健全现代流通体系，改造升级物流等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强数据、信用、监管等制度规则“软联通”，推动形成规模更大、结构更优、质效更好、机制更完备的强大国内市场。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要载体，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这些重要部署，体现了我国城市发展从“摊大饼”式外延扩张向“练内功”式内涵提质的转变趋势。

在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下，如何激活潜在需求、扩大有效需求？如何优化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解题的“钥匙”也蕴藏在城市内涵式发展之中。作为承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城市发展得好不好，关系着国民经济循环是否畅通、高质量发展成色如何。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就是要实现城市内部结构优化和功能升级，从追逐城市建设规模，转向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高品质需求。为此，需围绕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发展方向，探索如何以高品质供给塑造经济增长新空间。

聚焦创新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城市拥有数量可观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通过建设高能级科创平台、营造“雨林式”创新氛围，能够将科研优势快速转化为产业优势，激活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从微观层面看，技术进步还能进一步降低创业门槛。从直播电商、内容创作的“网红经济”，到依托人工智能赋能的“超级个体”“一人公司”，各类新兴经营主体持续涌现，构成了城市发展中 richest 活力的因子。

聚焦宜居乐居，拓展品质生活消费链。人民群众居住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意味着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栖身之所，而是安全、健康、便捷的“好房子”“好社区”。要通过城市内涵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住房需求。例如，上海推动“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在其中嵌入社区食堂、托育中心、健身驿站等精细化生活配套，不仅有效提升生活便利度，而且直接带动了社区商业活力。

聚焦美丽健康，培育绿色康养新业态。建设美丽城市，将绿色元素融入城市肌理，一方面能催生巨大的绿色制造需求，带动上游的新能源、环保等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优美的生态环境还能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为文旅、康养等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夯实基础。例如，成都作为公园城市首提地，建设各级绿道突破1万公里，将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孵化出都市露营、乡村游憩、骑行运动等丰富的消费场景。

聚焦安全韧性，筑牢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是城市发展行稳致远的基础。面对极端气候变化等冲击，建设韧性城市已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发展平急两用设施、构建智慧应急体系等的安全投入已成为规避风险损失、护航城市发展的战略所需。

聚焦人文互动，提升城市软实力。文明是城市的灵魂。通过赓续历史文脉，打造沉浸式文旅场景，城市将不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而是有故事、有温度的体验场。此外，城市的人文基因不仅是增加客流量、带动文创消费提升的密码，也是吸引各地人才汇聚创业的重要因素，将催生深度研学、时尚国潮、精品民宿等新业态。深挖城市的人文资源还可跨界赋能创意设计、影视动漫等关联产业，大幅提升城市吸引力，并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可感知的地方经济硬实力。

聚焦智慧便捷，激发城市经济活力。加快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有诸多利好。一方面，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例如，杭州通过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强化数据共享和流程升级，实现“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的转变，大幅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另一方面，能够普遍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智慧交通有效缓解城市拥堵，智慧医疗优化基层诊疗。数字化手段还能直接创造经济效益。深圳、苏州等地推出数字人民币红包，与文旅消费、绿色出行等场景深度结合，既提升了市民生活便利度，也创造了新商机。

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告别“穿新鞋走老路”，还需要依托制度优化提供保障。一是改革评价指挥棒。从关注规模和速度转向更加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居民收入、绿色安全、文化吸引力，因地制宜构建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评价体系。二是完善规则体系。顺应存量更新趋势，强化土地、产业、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构建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形成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城市发展的长效机制。三是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多元共治格局，畅通各方参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的渠道，将广泛的社会共识有效转化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作者系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本版编辑 李子娇 美 编 夏 玮

来稿邮箱 jjrbl@sina.com

# 把握人工智能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机遇

姚连营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在国际经贸领域，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显著降低贸易成本、提升服务效率，推动跨境电商模式升级，驱动数字贸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和国际竞争新赛道。“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必须牢牢把握人工智能时代数字贸易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助力我国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快速迭代期，数字贸易相关规则体系尚未定型，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能够为数字贸易创新发展提供良好条件。2024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规模达2.9万亿元，同比增长6.5%；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主要指数字订购贸易）达2.7万亿元，同比增长14%。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将进一步释放数字贸易潜力，为稳外贸、扩内需、促消费提供强劲动力。

人工智能技术拓宽贸易边界。传统服务贸易受制于不可存储性、生产与消费同时性等固有特征，在国际贸易中占比远低于货物贸易。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正在改变这一格局。聚焦提升服务数字化、标准化、模块化水平，极大增强了服务的可贸易性，使医疗、教育、设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突破时空限制，以数字形式实现跨境即时交付。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正在成为独立的贸易标的，从底层的算法模型、中层的平台服务到上层的解决方案，人工智能技术贸易品类日益丰富，算法授权许可、智能化解决方案等新

型数字产品的交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颇具规模的市场。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贸易模式转型。传统贸易模式往往依赖展会、代理商、经销商等线下渠道建立合作关系，供需信息分散，履约周期长，交易成本较高。而人工智能的介入重塑了贸易的价值创造逻辑，实现从信息匹配到主动价值创造的转变。从认知维度看，人工智能通过整合历史交易数据、产品特征、企业画像等多维信息，不仅识别显性需求，更能挖掘潜在需求，构建了超越以往认知边界的供需匹配机制。从交互能力看，大语言模型的语义理解能力和数字人的拟人化交互，能够破除语言文化差异带来的交易壁垒，使全球贸易主体实现无障碍交流。从执行效率看，通过运用区块链与人工智能融合的智能合约技术，将交易规则代码化、执行过程自动化，使贸易从基于信任的人际博弈转向基于算法的程序运行，促进交易效率大幅提升。这种转型本质上是贸易活动从信息化向智能化演进的过程，推动全球贸易进入新阶段。

人工智能技术改变全球贸易竞争格局。传统国际贸易建立在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基础上，而人工智能时代的贸易竞争已转向以算力、算法、数据为核心的数字要素的比拼。这种范式式的转变，意味着国际贸易从依托物质资源的比较优势，演进为基于技术创新的竞争优势。此外，人工智能引发的算法治理、技术标准等新议题，将推动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的系统性重构。掌握先进算法模型、拥有强大算力基础设施、积累海量数据资源的国家，将在全球数字贸易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数字贸易发展，既是顺应时代大势的战略抉择，也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紧迫任务。当前，我国数字贸易发展还面临一些挑战，特别是在大模型、智能算法等关键领域存在短板，在数据跨境流动、算法治理等规则制定中话语权有限。这就要求我们聚焦关键领域，系统把握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的重点方向与关键路径。

一是以大模型为引擎。大模型是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性支撑。要聚焦物流、金融等关键领域，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构建从基础理论突破到产业化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形成覆盖贸易全链条的智能化解决方案。数据资源是驱动大模型进化的核心要素，高质量数据的获取、处理和应用能力决定了贸易大模型性能的上限。应抓紧建立相关数据基础设施体系，实现海关、商务、税务、金融等多源数据的深度融合与价值挖掘。可考虑建设相关试验区，在数据跨境流动、算法治理、新业态监管等领域先行先试，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二是以跨境电商为载体。跨境电商是数字贸易的主力军，要聚焦关键环节重塑电商贸易模式。智能选品是跨境电商价值链的起点。要构建涵盖消费趋势预测、需求动态识别、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的智能决策系统，发展具备跨文化消费行为分析能力的智能平台。智能营销是连接产品与全球消费者的桥梁。要发展多语言内容自动生成、个性化推荐算法、数字人等技术，创造全时空、多语言、个性化的商业交互新模式。智能化的物流网络是将线上交易转化为实际价值的核心支撑。要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运输路线优化、调配仓储资源等，实现物流全程

可视化、智能化，为“买全球、卖全球”提供支撑。

三是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作为国际贸易的新增长点，服务贸易是人工智能应用的蓝海。要推动服务贸易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在技术输出、文化传播、知识服务等方面构建立体化竞争优势。以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出口为突破口，推动国产大模型能力开放和人工智能服务平台国际化。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构建内容生成、文化译译、市场分发的智能链条，进一步增强数字文化产品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设计、咨询、研发等领域，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和交付效率，发展以技术创新和知识密集为特征的高端服务贸易，实现我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价值链上的位势攀升。

四是以数字平台为支撑。数字平台是数字贸易的组织形式，也是人工智能赋能的重要载体。应充分发挥平台在连接供需、配置资源、创新服务方面的独特优势，形成超级平台、垂直平台、新型平台协同发展的立体格局。积极推动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级数字贸易平台进行全球化布局，建立覆盖全球的数据中心网络、跨境支付体系、智能物流节点。推动垂直贸易平台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在钢铁、化工、机械等传统领域建立基于人工智能的撮合机制、信用体系与金融服务。搭建人工智能原生应用的新型贸易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端到端的智能化外贸解决方案。

（作者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工业大学基地研究员）